

路遥的小说世界

阎慧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MULU

导 论 / 001

- 一、路遥研究现状综述 / 003
- 二、路遥小说的基本要素 / 016

第一章 作家论 / 039

- 一、童年经验对路遥小说创作的影响 / 039
- 二、浅论路遥小说的创作动机 / 047
- 三、试论路遥创作中的悲喜剧情结 / 056
- 四、路遥小说创作中的男权意识 / 067
- 五、从《平凡的世界》中看作家理想的文化人格 / 075

第二章 作品论 / 088

人物篇

- 一、高加林的悲剧内涵 / 088

路遥的小说世界

- 二、珍爱生命 / 095
- 三、主体意识缺乏的悲剧女性 / 100
- 四、孙少平的自卑情结 / 105

意蕴篇

- 一、“城乡交叉地带”的丰富内涵 / 116
- 二、“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化冲突 / 123
- 三、善与美的呼唤 / 137

艺术篇

- 一、艺术张力的生成与表现 / 148
- 二、试论路遥小说的修辞艺术 / 157

第三章 比较论 / 170

- 一、《红楼梦》对路遥小说创作的影响 / 170
- 二、追求者的悲歌 / 180
- 三、路遥对柳青的继承与发展 / 193
- 四、情爱意识的不同表现 / 205

结语 / 214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 218

后记 / 221

导 论

路遥，原名王维（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县榆林地区石咀镇王家堡村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家庭困难，作为长子的他被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的伯父。伯父家也很穷，路遥的幼年、少年时期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尽管如此，1961年初小毕业后，他还是“挑着破烂的行李”来到对他来说像是“都会”一样的延川县城，上了高小，两年后进入全县唯一的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就一直留在学校，写了许多派性文章。1968年作为革命群众代表担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第二年被革职，回到了郭家沟做小学教员。1970年再次来到延川县城以民工身份四处打零工，并加入延川县文艺宣传队，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开始了诗歌、散文创作，笔名路遥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由于在学校期间他系统地阅读了各类书籍，再加上自己当时已拥有了一定的文学创作业绩，因此受到了《陕西文艺》编辑部的赏识，经过实习，1976年大学毕业后正式分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1982年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

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和研究者的关注。路遥的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3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优胜红旗》，1980年发表成名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并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

一、路遥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路遥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与作家研究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

(1) 关于马建强的研究。

马建强是路遥早期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主人公。单独关于该人物形象的研究是没有的，只是散见于其他的文本分析中。韩玉珠认为我们可以责备马建强身上固有的某些小农经济的落后意识，但他那自强不息的人格理想和顽强奋斗的精神境界却是很令人赞赏的，他那战胜饥饿、屈辱、诬陷、歧视、冷漠、孤寂等艰难困苦的非凡勇气和信心是值得学习的。^[1]

(2) 关于高加林形象的研究。

高加林是路遥在《人生》中毫无矫饰地塑造出的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个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轰动效应而且思想内涵上有争议的人物。该小说通过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了生活中丑恶和庸俗，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小说一发表就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热切关注，评论文章达 120 多篇，其中专论高加林的就有 30 多篇。评论界公认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但还存在着明显的争议。

首先是关于高加林形象的定位。

雷达认为高加林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的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他是农村母体经历了十年内乱后一个“应运而生”的新生儿，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的胎记，但总体看来，他

一番激烈的争论后，评论界观点虽说还有分歧，但一致认为高加林是路遥为新时期文学画廊塑造的复杂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之无愧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次胜利。这对我国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某种深远的影响。”^[12]

(3) 关于刘巧珍形象的研究。

刘巧珍是《人生》中的女主人公。吴宗蕙认为刘巧珍是农村新女性。她不知书却达理、文化贫乏而精神丰富、刚强自重却柔情似水，她在保守闭塞的环境中勇敢追求爱情，并用感人的行动写下自己对爱情的深刻理解——爱就是奉献，爱就是宽容。在她身上，作者倾注了热情、熔铸了理想，表达了对社会、人生、未来的美好期望和希求。^[13]徐忠则认为刘巧珍虽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但在她身上存在着许多与时代精神相悖逆的封建色彩。高刘的爱情悲剧实质上是对愚昧落后的否定。^[14]蔡翔则认为刘巧珍在精神上是那么富有但又是那么贫困。她的善良和着愚昧，谦让伴随着自卑，纯真却又不免简单。这些矛盾反映出我们民族现状中呈现的二重的心理状态：感奋着时代的变化却又时时被旧观念、旧道德限制了精神世界的发展。^[15]

(4) 关于孙少安、孙少平形象的研究。

孙少安、孙少平是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男主人公。在小说刚刚推出第一部时，学者们就把他们兄弟与高加林的性格特点进行了比较，认为“孙少安、孙少平是《人生》中高加林形象的延续和裂变，他们是作家将高加林个性和灵魂的自身矛盾进行了调整和融合后而产生的新形象。孙少安更多地保留了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文化观念，孙少平则更多地接受了世界现代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影响”。^[16]李星则认为“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没有高加林式的好高骛远；他们有为实现理想的奋斗决心，但却没有高加林式的极端个人主义，比起高加林来，他们更现实，更愿意把理想的实现附丽于整个农村现状的改良。从某种意义上说，

少安、少平既是高加林追求精神的继续，又是对高加林追求方式的否定。”^[17] 曾镇南指出，“孙少安和孙少平，是古老的黄土地养育出来的两个历史之子，又是生活大变动催生的两个现代之子。他们是亲兄弟，从血缘到气质，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于生活道路、阅历经验、文化熏陶的不同，思想性格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是具有不同的典型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两个发展中的典型性格。”^[18]

郑万鹏认为孙少安是新一代农民形象。在发家致富道路上，他思想解放，体现出一种开放精神，而在人生道路上，亦即道德人生中，他则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继承了父辈身上具有永久意义的精神价值，让传统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发扬。^[19] 周承华则认为比起孙少安，孙少平的人生追求有一种更为宽阔的胸怀、一种更为自觉的奋斗意识，他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显然是在一个更高的人生层次之上的。^[20] 吴三冬则对孙少平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孙少平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就只能走一条比当一个普通农民更苦的道路。孙少平表现的吃苦、屈辱和牺牲精神都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其道德价值却不能不让人怀疑。孙少平的追求不是主体的实现而是主体的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孙少平的悲剧是自觉放弃自我个性以适应现实的悲剧，是精神悲剧、人格悲剧。^[21]

2. 审美特色

韩玉珠认为路遥作品的审美特色是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美。^[22] 李星则发现“深沉、宏大”是路遥所具有的艺术气质，也是他在全部创作过程中所苦心孤诣追求的艺术目标，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23] 李勇则进一步指出赋予这种深沉而宏大的审美品格的精神支柱是作家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是“浓烈的情感色调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理想的热情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化了《人生》的悲剧主题，使之呈现出崇

高、悲壮的审美特色”。^[24] 畅广元认为路遥作品表现了新时代的崇高美，一种在平凡中显示的崇高美，这样就把作品的美学特色与时代精神巧妙地融合起来。^[25]

3. 题材领域

纵观路遥的小说创作，评论者一致认为“城乡交叉地带”是作家一贯的题材选择。安本·实认为“交叉地带”是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并集中探讨了这一关键词和路遥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26] 李勇认为“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瞭望社会人生的窗口，这个敏感区包蕴于他的生活经历中，并打上了时代的印痕。因此，作品才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才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和高层次的审美认识价值。^[27] 刘志明认为路遥“城乡交叉地带”小说突破了纯乡土或纯都市小说题材相对狭小的局限，是理性地观照城市和农村及两者的大碰撞，在城乡交叉地带营建了一座精神的家园，探寻重构理想人格的可能性。^[28] 所有这些认识虽然只是停留在浅表层面，没有发现“城乡交叉地带”本身的深刻蕴涵以及它对于路遥创作成功的重要意义，但却为我们解读路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角。

4. 艺术结构

艺术结构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雷达认为路遥《平凡的世界》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史的骨架与横向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从而使作品显示出史的宏大、诗的厚重。^[29]

5.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1987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后，《花城》与《小说评论》编辑部曾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学者一致认

行准确的界定。在《中华读书报》多次组织的“中国读者最喜爱的20世纪100部作品”的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始终名列前茅;在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听众最喜爱的小说联播”问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亦名列榜首。这是读者的心声,这就说明路遥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对于他的研究还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的。然而在当代文学史中,路遥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仅把《人生》放置在“感应时代的大变动”一章里加以介绍,其视角还是传统的社会学的,缺乏从文化、人性等角度对路遥作品进行科学的评价。而在华中师大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则根本未提及路遥。如何对一个作家做出定位并不仅是对作家创作的尊重,其实还是对读者的尊重,科学的定位将有助于营造一种良好、健康的文学创作、文学欣赏的氛围,从而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文学史的学者在对作家进行定位时,不能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作家作品进行随意地吹捧或贬抑,而要根据已存在的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界、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的客观事实,对其价值和地位给予科学的界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研究,让更多的人喜欢路遥、理解路遥,以此表达我对自己最喜爱的作家的怀念。

注释:

[1] 韩玉珠:《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美》,《小说评论》1992年第6期。

[2] 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

[3] 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也谈高加林》,《文

[18] 曾镇南：《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

[19] 郑万鹏：《〈平凡的世界〉：中国农民二次翻身的史诗——与〈安娜卡列尼娜〉比较》，《中国文化研究》总第24期。

[20] 周承华：《现代理性与传统感情之间——论〈平凡的世界〉的审美特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

[21] 吴三冬：《孙少平的人格悲剧》，《小说评论》1999年第4期。

[22] 韩玉珠：《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美——评路遥作品的审美追求》，《小说评论》1992年第6期。

[23] 李星：《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24] 李勇：《路遥论》，《小说评论》1986年第5期。

[25] 畅广元：《表现新时代的美——论路遥作品的美学特色》，《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26] 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27] 李勇：《路遥论》，《小说评论》1986年第5期。

[28] 刘志明：《理想人格的探寻与重塑——论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小说》，《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

[29] 刘志明：《理想人格的探寻与重塑——论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小说》，《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

[30] 《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花城》1987年第3期。

[31] 曾镇南：《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

[32] 宗元：《路遥〈平凡的世界〉的结构艺术》，《名作欣赏》1994年第4期。

[33] 白烨：《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1991年第4期。

[34] 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35] 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花城》，1987年第3期。

[36] 周承华：《现代理性与传统感情之间——论〈平凡的世界〉的审美特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

[37] 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版第5期。

[38] 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39] 马至融：《理性意识：路遥小说的炽热点》，《延安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40] 王西平：《路遥小说中的道德意识》，《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41] 常智奇：《在苦难意识中展示人的内在性——侧评〈平凡的世界〉的艺术追求》，《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42] 宗元：《论路遥小说中的苦难意识》，《济宁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43] 李建南：《论路遥创作的乡土特色》，《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44] 赵学勇：《路遥的乡土情结》，《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5] 闫雪梅：《路遥的自卑情结》，《榆林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二、路遥小说的基本要素

当代作家路遥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政治的大变动而成长起来的，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像其他当代作家一样，他拿起笔进行创作不是消愁解闷，不是游戏人生，他的写作是基于某种责任感来表达对理想境界的渴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演绎出种种是非曲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就是八十年代前后中国文学的基本内容。路遥也不例外。但是，路遥之所以能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自己的显著位置，远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他用那支饱蘸激情的笔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立体的、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细致考察这一世界，我发现有十点基本要素。

1. “城乡交叉地带”的题材领域

路遥于 1949 年出生在陕北一个偏僻地区的农民家庭，1961 年初小毕业后，他“挑着破烂的行李”来到对他说来像“都会”一样的延川县城上了高小。两年后进入全县唯一的中学，后又重新回到农村，在郭家沟做小学教员。一年后，再次来到延川县城，以民工的身份四处打工，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开始诗歌、散文创作。1973 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以上是路遥的简历。正像每个作家都有其熟悉的生活领域和特有的选材角度一样，路遥的作品着重表现的是在城市物质文明冲击下农村青年的生活、愿望和追求。他的小说写的大多是农村题材，但又不局限于农村生活，还把笔触伸进城镇的一些角落，用他的话来说，他写的是“交叉地带”。根据路遥后来的具体阐释和他的创作实践看，他所谓的“交叉”主要着眼于“种种矛盾，纵横交错，就像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耀眼的光亮面，也有暗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1]

内涵就是使人实现自己作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全部潜能。追求意识使路遥小说超越了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了恒久的艺术价值。

3. 诗化因素

当代许多作家致力于追求小说的诗化性。我认为小说具有诗化因素标志着小说艺术的进步，因为它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态，使小说摆脱了单纯描摹生活的琐屑、散漫、狭隘，从而变得更加凝练、更富有抒情意味和哲理意蕴。诗化因素在路遥小说中具体体现为：

抒情性。在客观冷静的叙写中，作家有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直接从作品中站出来讲话，好像一个抒情诗人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在困难的日子里》当马建强终于在父老乡亲的物质帮助下得以去县城上学时，作家忍不住借人物之口有这样两段抒情：

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续到了现在。

正是这贫困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困的父老乡亲们，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3]

再比如，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在描绘孙少平一天之内既沐浴了田晓霞的爱情甘露又目睹了小翠的不幸遭遇后，充满深情地议论到：“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想想看，当沙漠和荒原用它严酷的自然条件淘汰了大部分植物的时候，少女般秀丽的红柳和勇士般强壮的牛蒡却顽强地生长起来——因此满怀激情的诗人们才不厌其烦高歌低吟赞美它

《平凡的世界》中当孙少安从山西娶回不要彩礼的贺秀莲时，正逢热闹的“打枣”节。

农历八月十四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的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筐，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涌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圪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打枣节”。

在孙少安一家人上了庙坪的地畔时，打枣活动早已开始了。一棵棵枣树的枝杈上，像猴子似的攀爬着许多年轻男人和学生娃。他们兴奋地叫闹着，拿棍杆敲打树枝上繁密的枣子。随着树上棍杆的起落，那红艳艳的枣子便像暴雨一般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

妇女门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上了见人衣裳，头发也精心地用木梳蘸着口水，梳得黑明发亮；她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拣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香喷喷，甜滋滋地嚼着。此时，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有也悄悄地爬到枣树上去了！他一边打枣，一边嘴里还唱着信天游呢。^[13]

这些场面描写是有特殊象征意义的。通过这一幅幅富有诗情画意的风俗画，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我们民族生活中的风土人情、道德观念、节庆仪式、习惯爱好等，因而同时具有了美学的

第一章 作家论

一、童年经验对路遥小说创作的影响

童年是人生命的起点和全部人生的展开，这一过程尽管相当短暂，却给人们留下终生不渝的印象，尤其是艺术家的创作，往往打上童年难以磨灭的印记。所谓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人在儿童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各种因素。”^{〔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有生养他的父母，有养育他的故乡，还有属于他的独特的生活故事和喜怒哀乐。这一切构成他最初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际，形成了他的短暂的却是重要的经历。然而，完整的童年经验并不仅仅是指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记录，它还包括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可以这样说，童年经验基本上是一种心理效应，它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而流动着、改变着，这也就是说，童年经验作为一种体验更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童年经验的这种性质对作家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本文具体以路遥的小说创作为例分析童年经验对其创作的影响。

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深刻理解。与此同时缺失也刺激人的想像力，换言之，当人的感觉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的想像力更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一个在童年时期挨过饿的作家，与从未挨过饿的作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的想像力也是不同的。由缺失所引起的异常认知和想像力的活跃，都可以成为创作的动力源。此外童年生活的苦难不仅使得作家心中积聚了太多的人生体验需要宣泄，而且它还推动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去超越自卑追求成功，以补偿自己童年的缺乏，特别是补偿心理渐渐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动力，促使他通过文学创作的成功消解不幸，实现自我价值。

第三，作家的童年经验以生活原型和题材的形式直接进入作品。

路遥的作品总是以“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知识青年为主人公，写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进入城市，写他们向城市进军的过程中经受的苦难、屈辱以及内在的矛盾冲突，这一稳定的审美定势主要还是源于作家自身的童年经验。三年初中是路遥一生中最难挨最困苦岁月，饥饿常常伴随着他。他没有生活保障，交不起最低的生活费，有时甚至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都吃不起。学校的饭菜分甲、乙、丙三类，路遥从来都是丙类：黑窝头、稀粥、野酸菜，就这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的饭钱。这段刻骨铭心的饥饿史被他几度写入《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特别是《在困难的日子里》，其中的自传色彩更加浓厚，其中对因贫穷造成的饥饿、屈辱的描绘更是触目惊心。下面是小说中主人公因饥饿而产生的各种心理体验：

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缩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口嚼大咽。我对的吃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

下去了。上数学课时，我就不由得用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3]

这些体验其实就是作家当时真实的生活境遇，真实的情感体验。此外，路遥中学毕业后，曾返乡劳动，当过生产队长，做过小学教师，在县城作过各式各样的临时工，这些生活经历也都作为原型进入作品。

最后，童年经验作为先在的意向结构对路遥的创作还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所谓意向结构，“就是一个人所形成的具有固定结构的心理图式，它使一个人在某种场合容易或带有习惯性地做出某些事情和感受到某种东西。”^[4]意向结构对一个人的认知活动（包括体验活动）具有很大的控制作用，意向结构的形成涉及很多因素，包括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以及其后他的必然和偶然的不幸、痛苦、幸福、欢乐、他的缺失，他的丰溢，社会的、时代的、地域的、自然的条件等等这一切都以整合的方式沉淀在作家的意识深处，但童年经验却是意向结构的奠基。

作家的意向结构是如此顽强，对他一生的创作都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引导、制约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作家后来创作的成败，作品的基调、情趣、风格等，起源于他的意向结构的最初因子——童年经验。路遥的童年经验对路遥创作的影响在其作品中表现为两种典型的意向结构——苦难情结、恋母情结。

苦难情结。前面已论述了有关路遥的童年生活，恶劣的自然环境、家庭的物质贫困、亲情的丧失等等，这一切使他一颗幼小的心灵过早地、深深地镌刻着人生的苦难与不幸，这一切促使作家的性格和气质朝着忧郁与孤独的方面发展，从而最终积淀为一